

鄭觀應本名 “鄭張應”

澳門博物館藏鄭觀應家族文物初考

陳麗蓮*

澳門博物館所藏的一批與鄭觀應有關的文物，為鄭觀應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鄭觀應家譜《榮陽家譜》（積善堂存本）竟赫然披露了從未為人所悉的鄭觀應本名；鄭觀應家庭合照的拍攝地點仍像今天鄭家大屋所見的樣貌；鄭觀應父親鄭文瑞的一張字據改寫了鄭家大屋的建造年份，等等。隨着鄭觀應史料的不斷被發現及整理出版，鄭觀應研究這個課題仍有很大的空間有待學者們辛勤耕耘。

鄭觀應（1842-1921）“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1）}他當日之主張——

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蓋憲法乃國家之基礎，道德為學問之根柢，學校為人材之本源。政治關繫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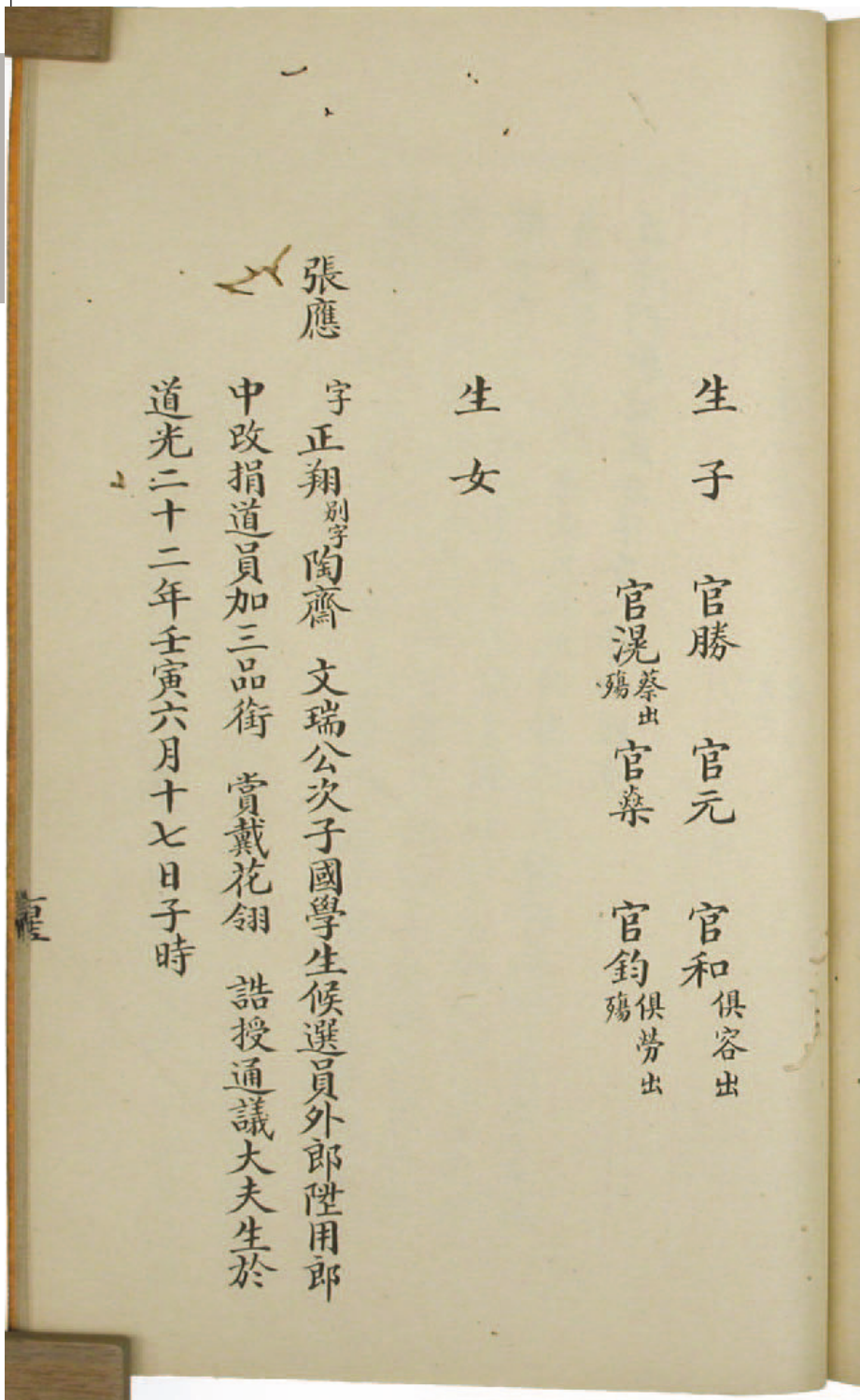
此言於百年後的今天仍擲地有聲！即以此觀點來審時度世，尚別具深義！鄭觀應由於“經營商業五十餘年，究心當世之務，頗知其中利弊……特目擊時事，利權日損，漏卮日多，而惓懷家國之念听夕不忘”，因此他“凡有關大局利病者，罔識忌諱，上書當道，盡所欲言”^{（2）}，綜合其一生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從商經驗輯為《盛世危言》出版並

在全國廣泛流傳，其劃時代的改革思想對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和毛澤東均有所啟迪和影響。

鄭觀應與澳門有着深厚的淵源。他不單自稱“世居澳門”^{（3）}，還撰寫了多篇論述澳門世務的文章，收錄在《救時揭要》中。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也是隱居在澳門龍頭左巷鄭家大屋中的“鄭慎餘堂”之時輯著成書的。

2002年底，澳門博物館收編了一批由鄭家後人捐贈的文物。這批文物，對鄭觀應的生平以及鄭氏家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物證。其中既有對前輩史家的學術觀點提供佐證的新發現，也有對某些現有歷史資料例如鄭家大屋建造年份可供作修正的準確證據，更有首次披露的關於鄭觀應本人及其家族的珍貴史料，例如未為人知的鄭觀應本名以及其父遺囑等。本人自忖學識謏陋，雖嘗試將這些資料作初步的梳理，但深知難免出現錯漏紕繆，謹藉此不揣冒昧拋磚引玉，祈望前輩師長指正。專家學者們倘若因此而有興趣

*陳麗蓮，澳門博物館研究人員。



作更深入的研究，當可拓擴澳門歷史文化的視野，則善莫大焉。

鄭觀應原名和生卒年份

向來皆如此介紹鄭觀應：

鄭觀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等。⁽⁴⁾

中山雍陌村提供的於1937年纂修的《鄭雍陌祖房譜》上關於鄭觀應的資料，也記述如下：

官應公 字正翔 號陶齋 文瑞公次子 例貢生 候選分巡道 二品頂戴 賞戴花翎 署理廣西左江道 ……

因此，鄭觀應的原名一直以來就被認為“官應”。

然而據澳門博物館所藏《榮陽家譜》（積善堂存本）⁽⁵⁾其中關於鄭觀應的資料有以下記載：

張應 字正翔 別字陶齋 文瑞公次子 國學生 候選員外郎 陞用郎中 改捐道員加三品銜 賞戴花翎 誥授通議大夫 ……

澳門博物館藏《榮陽家譜》（積善堂存本）上記錄着鄭觀應本名為“張應”

此外，在同一本家譜其它部分，例如在世系表中，在鄭觀應之父鄭文瑞名下的生子名單中，鄭觀應的原名也是記為“張應”。由此推斷，“張應”兩字，不會是家譜纂修者的筆誤。因此，鄭觀應的原名似應為“張應”，而“官應”則為其另名。“官應”和“觀應”二名之所以更多地為人所知，乃因它們更多使用所致。在鄭觀應眾多的文章及信札中，即常以“官應”和“觀應”自稱。在鄭觀應之父鄭文瑞的訃文草稿（澳門博物館藏品）中，也以“不孝官應等侍奉無狀禍延顯考”為文首。為遵循慣例，本文仍採用“鄭觀應”為其“正名”之稱謂。

鄭觀應的生卒年份，曾有多種說法，但隨着研究的深入，學術界的觀點現已趨於接近。

鄭觀應的出生日期，“學術界眾說紛紜，從1840年到1844年五年，都有定為鄭觀應的出生年的。”夏東元教授則認為，鄭氏生辰應為：“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子時生，即公元1842年7月24日生。”⁽⁶⁾對照兩本家譜，《榮陽家譜》（積善堂存本）上鄭觀應出生日期的記載是：“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子時。”《鄭雍陌祖房譜》上的記載是：“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這些紀錄進一步佐證了夏教授的考訂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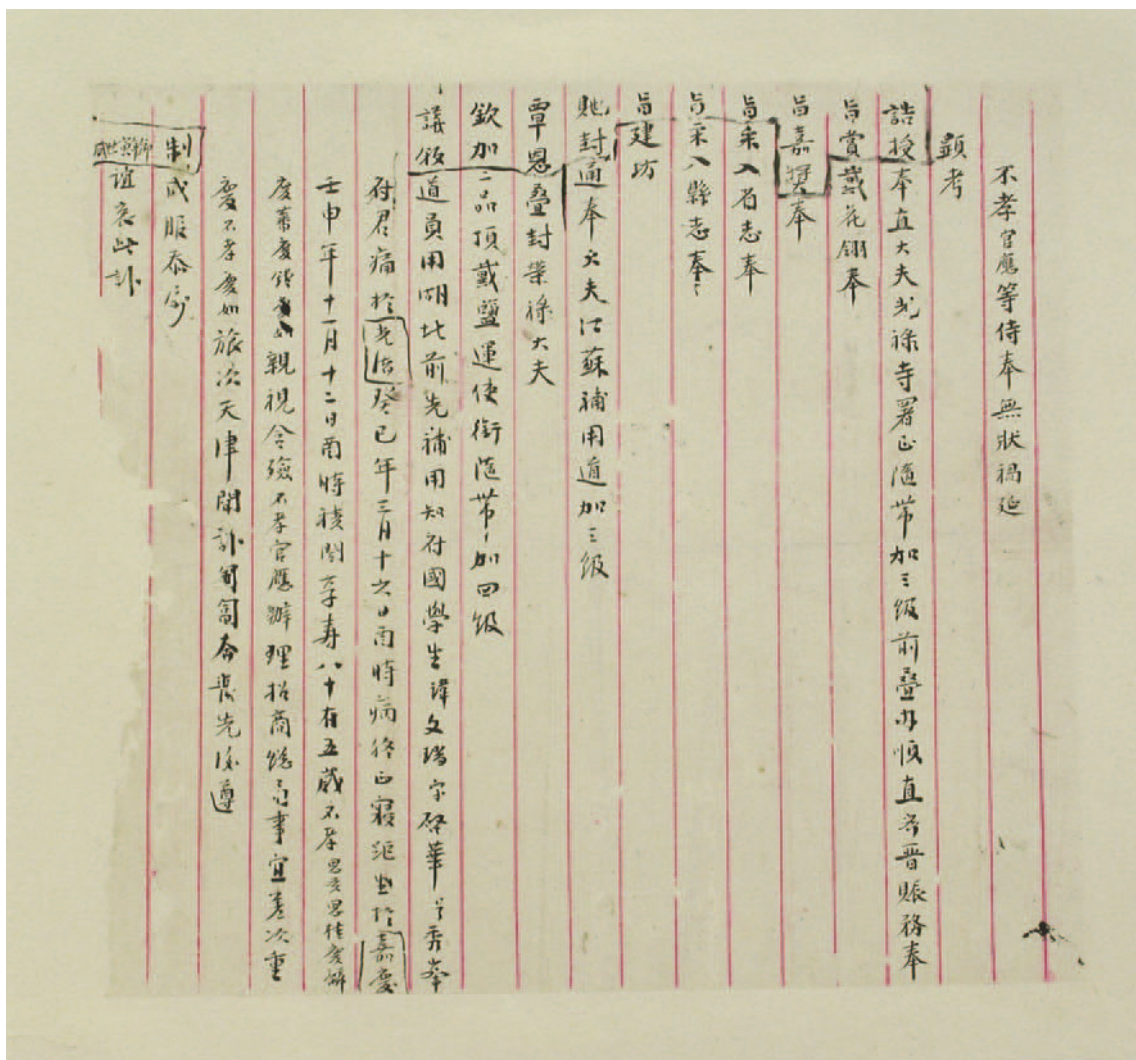
鄭觀應的去世日期，學者也有不同說法。夏東元教授在《鄭觀應》第十三章第45條註釋中解釋，他暫時採用1922年之說乃基於鄭觀應第三子



《榮陽家譜》（積善堂存本）紙本 20世紀初期
澳門博物館藏

鄭潤燊的憶述。但是，夏教授又提到：“我在中山市雍陌鄉看到香山鄭氏家族《房譜》中記載，鄭觀應於民國十年陰曆五月初七去世（1921年6月12日）。”⁽⁷⁾

《鄭雍陌祖房譜》的記載是：“卒於民國十年辛酉五月初九日，壽享八十。”同樣，1921年6月15日的《申報》曾刊出一則訃告云——



鄭文瑞計文草稿 澳門博物館藏



1921年6月15日的《申報》。《申報》上的〈鄭觀應計告〉見右頁剪報放大圖

清授榮祿大夫原任廣西左江道鄭公陶齋於夏曆五月初九日寅時壽終謹擇於五月初十日酉時大殮五月二十一日未刻發引權厝開北廣肇山莊哀此佈聞

幕設提籃橋華德路招商局公學內 鄭慎餘堂治喪處謹佈
戊A2441

據此，鄭觀應的去世日期應為“民國十年辛酉五月初九日”，即1921年6月14日，準確性更高。

鄭觀應家庭合照

澳門博物館藏的鄭觀應家庭合照，一直由鄭觀應之胞弟鄭思賢（1845-1920，名元亨，字正元，別號曜東）及其後人珍藏。根據鄭思賢之孫、文物捐贈人鄭先生的介紹，這幅照片收藏在鄭家大屋裡的祖先生卒年表背後，即一直掛在鄭家大屋第三房“鄭積善堂”的客廳。20世紀70年代，鄭先生從上海來澳門定居之前，他的父親——鄭思賢的第六子，在他臨行前叮囑他：務必要尋找到這張照片並妥善保管之。

相片中前排右四是鄭觀應，右二是鄭思賢。照片的拍攝地點就在鄭家大屋，具體位置為龍頭左巷大門後，迎面的建築物的陽臺（見頁170圖中“D”部分）。難得

的是，該處今天仍保留原樣。至於拍攝年份未能確定。由於鄭觀應之父不在照片之中，是否其時已去世？如果鄭父其時已去世，相片就可能拍在1893年之後。相片居中者為兩老嫗，推想可能是鄭觀應的繼母劉氏和庶母梁氏，因為其生母陳氏早在1849年即鄭觀應七歲時已去世。根據夏東元教授《鄭觀應》一書附錄二〈鄭觀應活動年表〉，1906年的記載有以下一條：“2月3日（正月初十日）繼母病死，‘丁憂’，在澳門‘守制’。”⁽⁸⁾因此這幀相片可能是拍攝於鄭父去世之後、鄭母去世之前的年份，即1893-1906年間。

鄭家大屋的建築年份

鄭家大屋由鄭觀應之父鄭文瑞（字啟華）起建，確切年份不詳。其建成年份，有學者根據鄭家大屋遺物曾國荃題匾推斷為1881年。⁽⁹⁾澳門博物館藏有一張鄭文瑞的字據，對鄭家大屋的建成年份具重要參考價值：

光緒十九年三月十二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存案人鄭啟華於同治十二年、西曆壹千八百七十二年正月，代三男正元一起造樓房壹所，計二座二進，共支總工料銀七仟三百六十圓。此銀由三男陸續如數早已匯回支發，並無短欠。此屋俟吾百年歸世之後歸還三男正元自行管業，與諸男無涉。右邊祖屋公用，左邊樓屋係二男正翔起造，歸二男管業。監工知見人房弟啟蘭。

字據內容顯示，1872年鄭文瑞代第三子鄭思賢起造“二座二進”樓房一所，“共支總工料銀七仟三百六十圓”。用當年“金條每兩卅八員五”⁽¹⁰⁾的市價作參照，這座房子造價不菲。

鄭文瑞立此字據，是要將鄭家大屋中屬於二子鄭觀應和三子鄭思賢的產業囑咐清楚。字據立後四天，即光緒癸巳年（1893）年三月十六日，鄭文瑞去世。

計
告
聞於清五授幕設初十監日夫橋西原華時任德大廣路招五商局二公學一內未鄭慎餘堂權五治厝開北九日寅時壽終謹佈
省議會議決江蘇各縣地方款產經理處條例在齊前省長任內久已公布吳縣知事溫紹
事當由總理負責特此聲明惟希公鑒
戊A2441



鄭觀應家庭合照 澳門博物館藏品

除了立此字據，鄭文瑞在前一天已召集家人面立遺囑。第三子鄭思賢（鄭觀應胞弟）後將所記遺囑鐫版付印。遺囑中有以下字句：

屋右之花園及長樓與文昌廳皆係歸公家各兄弟用，與大宅無涉。

根據上述字據和遺囑內容可作如此推斷：鄭家大屋起建的年份是在1872年或稍前。到了1893年，鄭家大屋已有字據中的“三男正元起造樓房壹所”、“右邊祖屋”、“左邊樓屋係二男正翔起造”三座建築物，以及遺囑記錄中的“歸公家各兄弟用”的“屋右之花園及長樓與文昌廳”。換句話說，1893年鄭文瑞去世時，鄭家大屋已形成產權分屬鄭氏不同族人的建築群，且已具今天所見的規模。

鄭思賢的這所“二座二進”房子，“右邊祖屋公用，左邊樓屋係二男正翔起造”，以澳門博物館藏

的於1950年做繪的〈龍頭左巷十號屋每層全面草圖〉比對，字據上描述的位置，與上顯示的位置基本相符，其位置也就是〈鄭家大屋修復平面圖〉中的“B”部分。“右邊祖屋”就是圖中的“C”部分。“係二男正翔起造”的“左邊樓屋”就是圖中的“A”部分，這“A”部分應該就是鄭觀應筆下的“鄭慎餘堂”，也即是鄭觀應輯著《盛世危言》之所在。至於鄭文瑞遺囑所紀錄的“歸公家各兄弟用”的“文昌廳”，就是圖中的“E”部分。但“長樓”是否就是圖中的“D”部分以及相連的長廊，仍有待確證之。

經實地考察，鄭思賢宅第的建築結構與“右邊祖屋”相倣，房子中間有一天井，實為一座兩層半的房子：第一層是地面層，第二層是二樓全層，而第三層祇是在“天井”之後另蓋起的。鄭思賢為這所房子添置了一批傢俱，有酸枝長案、椅、几和嵌石面方凳等，每件傢俱上均刻上“鄭積善堂 曜東重置”字樣，部分傢俱今已成為澳門博物館藏品。



鄭觀應家庭合照拍攝地點近況（2005年） 澳門博物館提供

光緒十九年癸巳三月十一日十點半鐘
 嚴親病重分諭各情謹列於右為各手足鑒之十一日十點半鐘
 合堂親戚姐妹到齊 父親傳賢到前面諭後事先囑打掃樓下
 各處等件後囑若有不測囑向大宅取銀壹萬兩為辦喪事計并
 云濟東有家財六十萬藏匿不與父知今其首念各妹多有窮苦
 無依者及三叔年老無食囑賢向大宅收回銀三十萬兩如查確
 其家產無六十萬那怕有三四十萬十萬八萬亦照數勒令交回
 一半并囑賢等將該款建鳴岐祖祠及祠分惠各窮親胞妹與胞
 三叔餘作堂業勿使各窮親饑寒又囑屋右之花園及長樓與文
 昌廳皆係歸公家各兄弟用與大宅無涉餘照遺書等件辦理囑
 賢在其房柜頂上箱內領取遺書等件派各子壹張賢見兄弟未
 歸曾對父言各件仍存母親處待各兄弟回家開派不遲父諭兩
 淚交流經屋中母親劉氏庶母梁氏長嫂梁氏二嫂葉氏弟婦布
 氏譚氏家姐曾氏楊氏歐氏鄭氏陳氏鄭氏又陳門鄭氏楊門鄭
 氏張門鄭氏甥婿吳芝軒房弟渭英妹婿陳雲從斯時六弟保之
 八弟官鏞均目見耳聞賢等奉侍不到為子者獲罪深重今承
 父命再三分諭各事敢不登明為手足親誼者鑒之即日十一點
 半鐘紀常華農等亦到 父親亦照示分諭一番賢等亦照父諭
 當眾道明紀常兄弟知之若其不忘宗背祖是其本倘其不
 以為是到時聽各兄弟再議無負
 老父一番泣血之囑也
 三月十三日忘賢謹啟

鄭文瑞遺囑見證記錄

澳門博物館藏品

昔日豪門成寒舍

過百年歷史的“鄭家大屋”，隨着主人的命途歷盡人世滄桑。它昔日的豪門氣派，今天僅能憑藉大屋的佈局和斑駁剝落的牆飾加以想象了。可歎的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之後，鄭家大屋被分租出去的一片衰敗景況，這一代澳門人迄今仍記憶猶新。上述的〈龍頭左巷十號屋每層全面草圖〉，是由第六房即慶鏞後人在 1950 年做繪的，圖上有一行文字說明：

廳位十二個，原則房位約五十四個，廚位八個，（以……作欄者，乃代表木欄房），由包租人轉租出約二十二伙。⁽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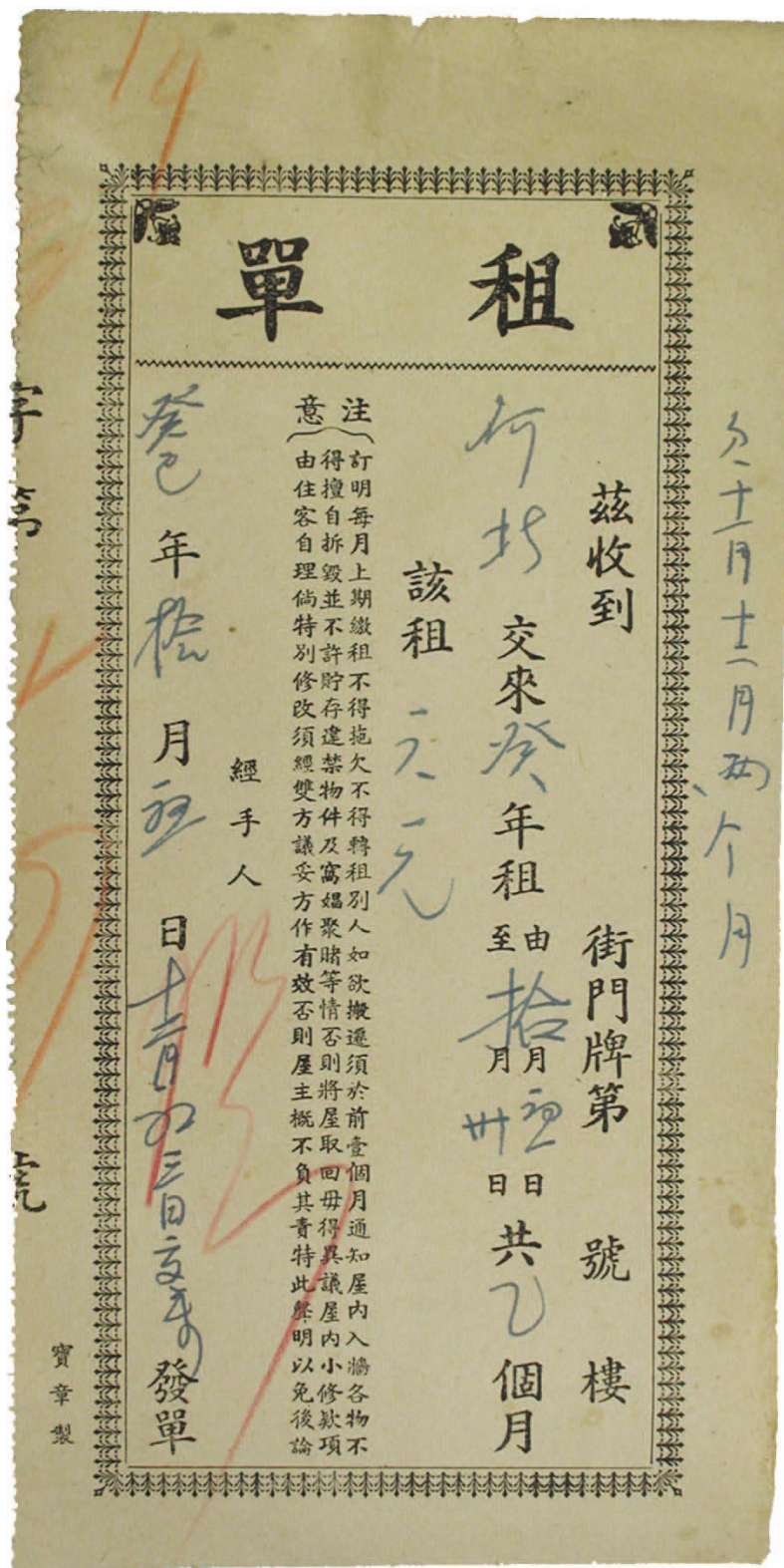
按圖所示，當時大屋多處地方，尤其是靠龍頭左巷大門的前半部分，地面一層已分割成多間“木欄房”。除了鄭氏家族的“六宅”、“四宅”、“九宅”在其中居住外，還羈入了“何北”、“鄧偉記”、“亞貴”、“賣雪仔”、“機器佬”、“韋宅”等住客。二樓也分別由“王基”、“渣車仔”、“地捫婆”、“水警”、“漁欄佬”、“八卦婆”等人居住。然而，



今天所見的文昌廳 澳門博物館提供



九宅範圍遺蹟 澳門博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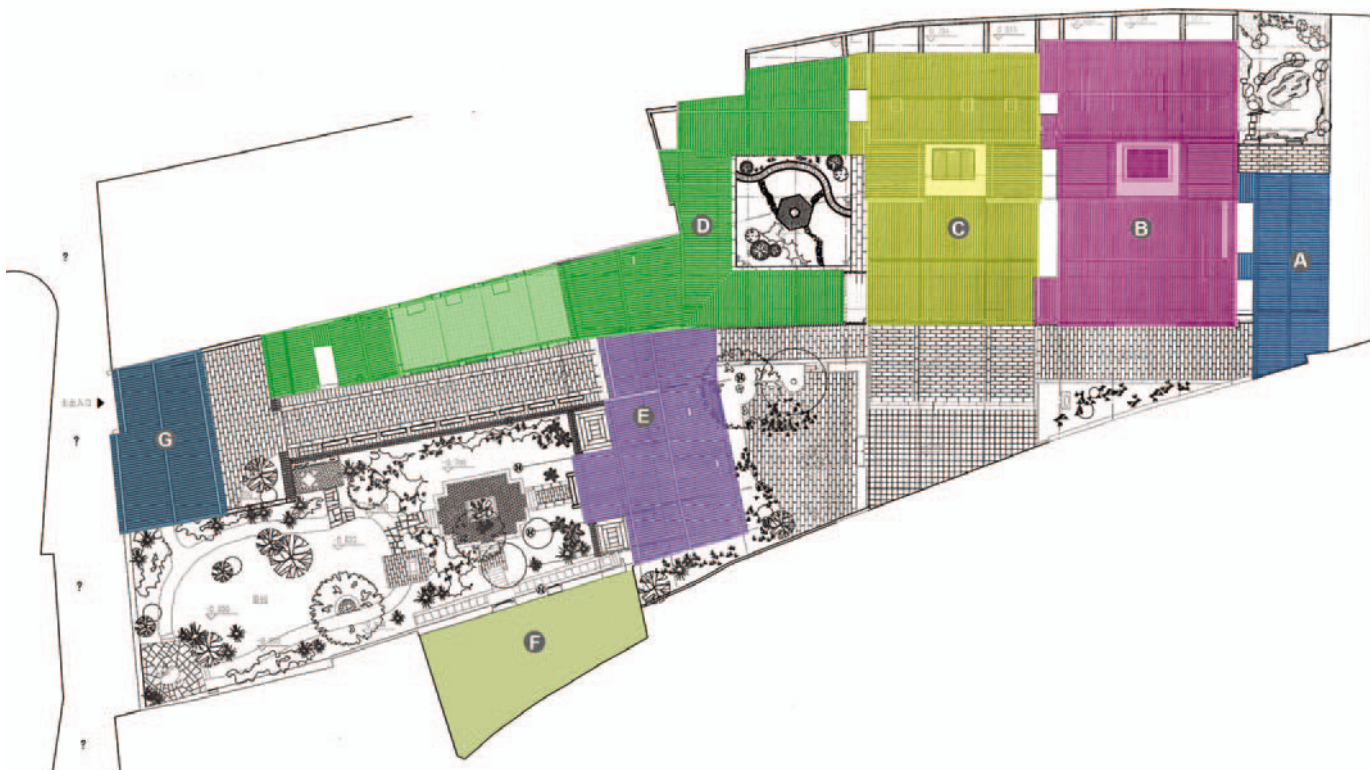
鄭家大屋租單（1953年） 澳門博物館藏品

原屬於鄭觀應和鄭思賢的產業的A、B部分，在1950年的〈龍頭左巷十號屋每層全面草圖〉中，則未有顯示分租予任何人等。根據文物捐贈人鄭先生憶述，20世紀70年代間，二宅及三宅的部分空間也分租出去了，而在80年代最多人等居住時，住戶幾近五十戶。

今天，在前花園旁邊原屬九宅範圍的一棟二層高的樓房（即F部分），已變成頹垣敗瓦不堪入目，昔日的後花園也已變為隔鄰的一幢住宅大廈了。

後記

在鄭觀應研究這個課題上，仍有很大的空間讓人們去做學術耕耘。筆者有幸忝為文化局屬下澳門博物館的一名研究人員，參與開闢新的研究專項，曾在2005年10月和11月到上海圖書館查閱《盛宣懷檔案》中鄭觀應分檔部分的原始文獻和資料卡，所見該檔案數量及其豐富精彩的內容足以令人震撼和興奮不已。據王宏〈上海圖書館藏鄭觀應資料綜述〉一文的介紹，上海圖書館藏有豐富的鄭觀應研究史料，包括鄭觀應著作和當時的報紙等，特別是“盛宣懷檔案”中有大量的鄭觀應資料，“文種可分為信函、電報、賬冊、公牘、合同、地圖、詩文日記，以及藥方等”。^{〔12〕}根據上海圖



鄭家大屋修復平面圖

澳門博物館提供

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的《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序言介紹，盛宣懷檔案已在整理中，我們期待這些史料早日付梓出版，向研究者開放，那將對鄭觀應及其思想體系的形成有更多的瞭解。此外，近年學界對李鴻章和洋務運動重新審視和評價，盛宣懷以及鄭觀應的研究也不斷被重視，因此有理由相信，相關史料和文物將會不斷被發掘出來，而新的研究成果也將隨之出現。

鄭觀應的思想體系及其《盛世危言》，曾在澳門孕育而成；鄭觀應及其巨著，為澳門歷史文化增添了一筆豐厚的遺產；鄭觀應故居“鄭家大屋”，已包含在澳門歷史城區之中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所以，我們深刻地感覺到，支持和推動鄭觀應學術研究，應為當今保護澳門世遺項目的責無旁貸的重任。

【註】

(1) 夏東元著，《鄭觀應》前言，頁1，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夏東元（編），《鄭觀應文選》，頁164、166，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聯合出版，2002年

(3) 全（2）頁416。

(4) 引自《辭海》頁1191，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三卷本）

(5) 澳門博物館所藏的《榮陽家譜》（積善堂存本），是根據同治二年（1863）由鄭啟燦重修的《壺源祖房家譜》的基礎上補充而成。由於是屬於鄭觀應三弟鄭思賢的“積善堂”存本，因此對鄭思賢一房人的記錄更為詳細。至於由誰執筆補充，家譜內未有顯示，但其筆跡與上海圖書館所藏的鄭觀應檔案內不少文件相似，日後或有機會疏理出來。家譜所載內容最晚的資料是關於鄭思賢之女金鰲的出嫁，時間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因此推斷此家譜的修編日期可能是在20世紀初。

(6) 全（1）頁16注釋（3）。

(7) 全（1）頁351-352注釋（45）。

(8) 全（1）頁390。

(9) 劉淦冰，〈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家大屋〉，《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六期，頁21，澳門文化學會出版，1988年。

(10) *Echo Macaense*（《鏡海叢報》葡文版），1893年7月25日頁4。

(11) “原則房位”即原來圖則的房間位置；“木欄房”即以木板分隔而成的房間——筆者註。

(12) 王宏，《上海圖書館藏鄭觀應資料綜述》，上海圖書館網頁，網址：<http://www.library.sh.ch/new-eng/lectures/list.asp?id=801>